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卓新平 ◎主编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李维建 著



A Historical Stud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卓新平 ◎主 编

曹中建 金 泽 ◎副主编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李维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 李维建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1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2867-3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伊斯兰教史 - 研究 - 西非
IV. ①B96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3370 号

· 世界宗教研究丛书 ·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

著者 / 李维建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王琛场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秦晶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范迎 责任印制 / 岳阳
总经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 23.5
版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字数 / 375 千字
印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097-2867-3
定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A】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世界宗教在我们所经历的世纪之交、千纪之交空前活跃，并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如何去认识、研究和理解世界宗教，这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中，人们已体会到宗教的普遍存在，并开始关注宗教问题，关心宗教研究，将宗教的作用及影响与现实社会的生存及发展密切关联。不过，在对宗教的认知和理解上，人们的见解和观点显然仍存有分歧，这给我们争取达到宗教审视之共识带来了种种困难，却也提醒并促使我们多层面、多角度地认识世界宗教的存在，观察其演变发展。

在对各种世界宗教的复杂体认中，大致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是把宗教作为人类精神及社会生活的“常态”来看待，从世界宗教中体悟出人的社会性、人本性、文明性和超越性。对此，宗教研究者有诸多表述，反映出其对宗教所关涉的主体或客体、集体或个体、内心或外在的不同侧重。例如，奥托认为宗教是“与神圣的交往”，在此突出人对“神圣”或“神圣者”的信仰。缪勒也指出宗教是人“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即人的内心的本能、气质、人寻求超越的渴望。斯特伦把宗教理解为“使个人和社会经历一种终极的和动态的转变过程”，其所言“终极转变”即从深陷于一般存在的困扰而彻底转变为体验到一种“最可信的和最深刻的终极实体”，由此在这种“构成生命的终极源泉”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和圆满。斯塔克则认为宗教是人之本性寻求补偿的体现，因而要追求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信仰生活。宗德迈耶尔对此曾强调“宗教是人类对于超越经验的共同回答”。蒂利希则突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希望从这种关怀中体现出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本真意义。总结

这些宗教理解，伊利亚德以宗教是一种“人类学常数”来说明宗教与人的密不可分，认为“人”就是具有宗教情结的人格存在，人的本质特性与宗教本质特性有着内在关联，人性乃宗教存在的本体性前提，有人就有宗教。宗教作为这种人性的“普遍性”还被柏格森所坚持，他宣称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中，或许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有可能找不到科学、艺术或哲学，但绝不会找不到宗教。

在上述对宗教的“常态”认知中，一般会把宗教的表现形式理解为作为“内在形式”的“宗教性”和作为“外化形式”的“宗教建构”，在宗教的功能形式上则将其理解为“超越性”形式和“安慰性”形式。比较存在形态的“宗教性”与“宗教建构”，我们会发现其“宗教性”以信仰内在的形式而给人“虚玄”之感，相关内容多涉及人的思想、精神、意念、情感；其外化形态的“宗教建构”则以其“实在”和“具体”性而反映出人类社会关系的构建，并以各宗教的社会、民族外观来代表与之相应的客体文化形态；在此，蒂利希认为宗教是文化的实质，文化是宗教的表现形式，其相互呼应则可展示文化的表层繁复与宗教的深层蕴涵之有机共构。但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理解上亦可换位，即把宗教看作人类的精神、文化形式，是其“象征化”或“符号化”。论及这种宗教与文明的关系，道森认为“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这样，宗教不离人类的文化构建及文明发展，并成为许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观和许多民族社团的精神家园。而在对宗教功能形式的认知上，一方面可看到宗教“超越性”形态的“终极性”旨归和对人类“自我升华”的憧憬，另一方面则可从其“安慰性”形态上体悟到宗教补偿功能所表现出的一种理想化的对“现实的幻想”，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的倒影”。它旨在使“此岸的缺陷”为“彼岸的充盈”所弥补，以宗教的慰藉来应对今生今世所遇到的一切，从而达到人们精神上的解脱。对此，恩格斯曾总结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从这种对宗教的“常态”理解中，进而指明宗教性乃“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规定性”。

二是从“问题意识”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即认为宗教的出现乃是人的存在或意识“出了问题”，宗教作为社会反映即为社会的“问题”反映。

如果基于这种对“问题”的评价，那么宗教的存在就不一定是社会的“常态”，甚至可能会被理解为一种“不正常”的状况。其实，在此所论及的“社会常态”乃一种被“理想化”、被人为拔高了的“常态”，或者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充其量也只是个别的、短暂的存在。从问题意识来理解宗教，则会关注人们反映这种问题的社会表层和心理内层，以及二者的复杂交织。在对个人心理内在的分析上，弗洛伊德创立了其深蕴心理学，并将其探究与宗教认知相关联。在他看来，宗教乃说明人的意识、人的心理状况出了问题，宗教实际上是表现出人的“有限性”、“依赖感”、精神压力和负担；而且，原初的宗教之诞生，就已反映出人与其“父母情结”相关联的“负罪感”，故此亦折射出人的心理问题。宗教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则在马克思的经典表述中清晰可见。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而且还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之所以被马克思视为“人民的鸦片”，就在于宗教表现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无情世界的感情”、“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因此，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实质上是其对宗教的同情和对产生出宗教的“问题”社会之揭露和批判。

当然，今天如果仍然从“找问题”的角度来看待并理解宗教，那么认识者本身至少会在潜意识上对“宗教”的存在及发展是持有怀疑或批评的看法的，即认为宗教反映出了一种“有问题”的社会存在，而且它并非社会主流所肯定、承认或希望的现象。显然，上述两种视角会带来对宗教“价值”、“意义”的不同观点，而且各自在对宗教的社会定位之审视和判断上也势必会有不同。尽管在今天看来单纯从“问题意识”上评说宗教已经暴露出了其不足和缺陷，这两种视角的宗教认知应该说却都是有其意义和必要性的。这些不同的视角能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并综合性地看待宗教。当然，以平常心来看待作为人类社会“常态”的宗教是在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所言的，而发现、审视宗教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则应基于其特殊性，以及其时空关联性。

其实，宗教在“使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神圣化”的过程中，会在人的精神上实施其最强有力的社会指导及控制。其积极方面会引导人们朝向崇高、达到升华、超越自我，而其消极方面也可能让人陷入偏执、狂热或痴迷。为此，贝格尔认为“宗教在历史上既表现为维系世界的力量，又表现

为动摇世界的力量”，因而有必要从其利、弊，正、负等双向功能上来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但我们对之仍需有主流性、总体性的把握。在精神文化意义上，对宗教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挖掘，既可对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获得更为深刻的体认，又能积极引导宗教适应并促进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正如道森所言，“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不理解宗教，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内在形态”；而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若把某种文化看作一个整体，我们就会发现，抑或有悖于人类社会的价值与规范的宗教，如果引导得体，也会对文化产生能动作用，并为社会变革运动提供动力”。由此而论，宗教对于人类社会存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非常复杂的功能。我们认识和研究宗教，应该持有“客观认识”、“积极引导”的态度。

为了对世界宗教有客观、真实、全面、深入的理解和研究，我们组织了《世界宗教研究丛书》，以基于上述考量来在宗教探讨上求真求实。在此，我们在面对世界宗教时，既会对之持有体认人类社会文化现象的“常态”，也会有我们自己在研究上的“问题意识”。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我们并不着眼于在研究世界宗教之范围上的系统、整全，而是重在其个案研究，具体分析，触及相关的人或事，以便能从点滴积累开始来面向世界宗教的浩瀚大海，纳百川之细流而汇入其汪洋博大。因此，我们希望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积少成多、渐成规模，以一种实在性、持久性来探究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世界各种宗教现象。“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们将锲而不舍，始终保持这种研究的开放性和开拓性。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9年7月1日

序 一

看到《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书稿，确实让人心中高兴。首先是为李维建博士所取得的学术成果高兴。在国内学术界这是首部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专著。他的执著和进步超出我的预期，特别令人欣慰。再者是该书的出版，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伊斯兰教重点学科建设取得进展的标志。我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作为宗教学的分支学科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尽管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可喜的是，该书的出版，一来表明年轻的研究人员已经成长，开始担当独立的科研任务；二来说明，学科的研究领域在扩大，学术的深度也在增加，学科应对国家要求和未来挑战的能力在提高。

说到研究领域，必须指出，无论是伊斯兰教研究，还是非洲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都是乏人问津。这里，存在难度的问题，非洲的民族、语言、文化和宗教既复杂又难懂，常常令许多人望而却步，或者改换门庭。由此带来的功利问题，也使一些人踟蹰、徘徊，甚至痛苦挣扎。李维建博士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也有类似的经历，但他最终感受到了学术和国家的需要，以一种使命感“逼迫”自己坚守专业阵地，同时又在探索中逐渐体验到学术的快乐。由于稳定了自己的专业追求，也有了个人的学术成果。

非洲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一个广博的研究领域。北非与西非联系紧密，通常列入中东或阿拉伯世界的范围。而西非与东非则有所不同。至于南部非洲更是自成一格。这些都是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回答的问题，也是李维建博士今后的研究领域。至于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点与非洲其他地区有不同之处，可供读者参考。

一、西非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洲当地人民的宗教。从历史上说，西非不论是局部还是整体，都从来没有不自觉地并入伊斯兰教，或者

在文化和语言上处于阿拉伯文化的绝对统治之下，后一点是与东非相比而言。西非是伊斯兰化在先，阿拉伯语在后。东非则是阿拉伯语在先，伊斯兰化在后。西非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索宁克商人，在进行贸易活动的过程中传播伊斯兰教，并在他们的民族中培育了专门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的传统。因此，西非除出现一些如廷巴克图那样的伊斯兰学术中心外，还出现了托罗贝人这样的宗教团体。托罗贝意为托罗人，即11世纪塔克鲁尔穆斯林王国的所在地的富塔托罗人。大约14世纪，一些游牧的富尔贝人信奉了伊斯兰教，逐渐形成毕生学习和传播宗教知识，但仍以游牧为生的专业集团。后来，扩展到豪萨人、图科洛人等其他民族，成为西非伊斯兰教学者和教职员的特殊培训方式，于是形成了一批伊斯兰教的教职员阶层。正是这批人，成为18~19世纪伊斯兰教改革和“吉哈德”运动的骨干和领导力量。

二、苏非教团在西非伊斯兰教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非伊斯兰教就是苏非教团。苏非教团的传播，对伊斯兰教与西非传统宗教的融合有促进作用，有利于伊斯兰教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中扎下根来。至19世纪初，卡迪里教团和提加尼教团在整个西非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改革和“吉哈德”运动的领袖，如奥斯曼·丹·弗迪奥是卡迪里教团的舍赫，而哈吉·乌马尔·塔勒则是西非提加尼教团的首领。20世纪创建于塞内加尔的穆里德教团，由于创建人阿玛杜·邦巴的努力，在国内拥有大批信徒，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重大影响。西非提加尼教团也因其现代领袖易卜拉欣·尼亞斯的超凡魅力，推动提加尼教团与伊斯兰世界沟通，使提加尼教团在塞内加尔与穆里德教团分庭抗礼，在尼日利亚得到迅速发展。苏非教团的舍赫因他们的品行和学识，在西非民间备受崇敬，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名称著称，如在豪萨族地区称麻拉目，在操法语的部分地区称马拉布特。他们常常到处游历，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走到哪里就与原住民一起生活，实际上起着教师、哲人和生活指导者的作用，由此而奠定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有时由他们发起的改革和“吉哈德”运动，在纯洁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反对统治者的腐败、特权和暴政，因而深得民众拥护，也为西非伊斯兰教打上深刻的烙印。

三、西非伊斯兰教在当代的迅速传播。在当代，伊斯兰教人口的增长

率一直高于其他宗教。据近几年的几种统计，伊斯兰教的人口增长率为1.7%~9%，而非穆斯林的宗教信徒的增长率为0.7%，其中基督徒（含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更正教、其他独立教会，以及边缘基督徒等）的人口增长率徘徊在1.3%上下。在伊斯兰教世界，西非是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在20世纪50年代，西非穆斯林估计约占人口总数的34%，而在今天，则已超过半数。整个西非的穆斯林年增长率达到3%。有人指出，这是在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竞争下，是在没有西方学校制度和西方医疗机构帮助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这一现实，有许多学者提出过多种理论做出分析，但至今尚无定论。问题远比我们所认识的要复杂，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思考。这正是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魅力所在。

西非伊斯兰教研究，从宗教研究和非洲研究角度来看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正是李维建博士这部专著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所在。正是由于这是一部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其中的稚嫩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好在该书铺就了一块质朴的基石，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就有了希望和期盼：希望李维建博士能不负使命和责任，继续加强学术功底和道德操守的涵养，在攀登的历程上步步高升；期盼我国的学术界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有志于非洲问题的研究，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发表，迎来我国社会科学的灿烂明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周燮藩

序二

伊斯兰教在非洲的历史非常悠久，经过与非洲传统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发展成为具有鲜明非洲特色的伊斯兰教。现实生活中的非洲伊斯兰教，更是随着非洲各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同国情和条件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特别是撒哈拉以南西部非洲的伊斯兰教，以其为世界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年增长率达3%）而备受东西方学者的关注。而要考察西非伊斯兰教的现状，不仅需要国别个案研究，更需要综合研究，李维建博士的这部力作，以19世纪前后西非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为主线，兼论殖民时期和当代西非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既追溯历史，又关注现实，是目前国内学术界首次从宗教学角度对西非伊斯兰教所做的一项综合性研究和开拓性成果。为了解非洲历史文化，促进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重要的人文背景资料，更为非洲史学者及研究当代非洲问题的专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如下。

一 系统全面的文献综述

《西部非洲伊斯兰教历史研究》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古今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观点、立场和方法，不仅有全书的总体研究综述，还有各个章节的部分研究综述。在评价阿拉伯语文献、富尔贝语、豪萨语等西非本地语言文献以及现代西方语言文献的同时，提出应当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研究目的，来归纳西非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作者认为，以伊斯兰文化的视角、殖民主义视角和多元视角三个阶段的划分，比较能说明学术界关于西非伊斯兰教研究视角及其转换的背景。如在近代殖民者征服西非

之前，穆斯林学者首先关注西非伊斯兰教，并主宰了中世纪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带有信仰的因素，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殖民时期法国学者对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完全是为殖民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服务。而自民族独立以后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所参与的多元视角研究，才是真正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

在运用国外文献方面，作者克服了相关中文资料奇缺的困难，主要依靠英文文献把握近现代以来英、法、美等西方学者关于非洲伊斯兰教的重要著述，因此而对非洲历史上繁杂的种族、部落、区域、王朝、国家，以及“吉哈德”运动、“马赫迪”、“苏非主义”等与伊斯兰运动相关的词语概念都有比较清晰的界定和表述。如“西苏丹”与“西部非洲”的概念和文化含义，“前三国时期”阿拉伯贵族主导下的北非伊斯兰教，“后三国时期”柏柏尔人宗教政治地位的上升，等等。同时，作者依据多数学者的观点，将 1900 年作为西非伊斯兰教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并强调阿拉伯人、柏柏尔人、黑人各部族共同参与了西非伊斯兰教的塑造。

针对国外学者将西非伊斯兰教历史阶段概括为“遏制、混合、改革”的三阶段论（第一阶段，非洲王权通过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分开居住的方式限制伊斯兰教的扩张。第二阶段，非洲统治者将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相互融合，非洲人有选择地实践伊斯兰教法。第三阶段，非洲穆斯林实行宗教改革，以剔除伊斯兰教中混杂的非洲传统，力求彻底实施伊斯兰教法），作者提出，还可以从宗教思想与实践的角度对西非伊斯兰教历史阶段作另一种划分，即将西非伊斯兰教依次划分为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时期、逊尼派时期、苏非主义时期、瓦哈比派时期。由于不同教派和苏非主义的轮番登场，西非伊斯兰教呈现出不同的信仰图景。正是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及其立场观点的吸收和评判，作者对西非伊斯兰教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特点都有较为详细的梳理和论述，见解独到，有所创新。

鉴于国外学者在此研究领域已有相当丰富的学术积累，而中国学者对西非伊斯兰教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少且成果少，故而全面深入地译介东西方的成果，将有利于未来中国的西非伊斯兰教学术发展。在综合利用国外前沿学术研究方面，作者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见前言与研究综述）。

二 历史与现实的论证与思考

西非伊斯兰教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苏非主义和“吉哈德”运动。从古代到现代，苏非主义在西非伊斯兰运动中始终具有组织与指导作用，以苏非教团为主导的伊斯兰教参与西非国家政治，是非洲宗教与政治发展的主要传统和特征。而西非“吉哈德”伊斯兰运动具有革命性、改革性、民族性、阶级性、反帝反殖性等多重性质，既是宗教掩盖下的政治冲突，又是一种文化运动。运动的结果，改变了过去伊斯兰教与非洲本土宗教“并行”、“混合”的状态，建立起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新政权。不仅为以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使西非居民的信仰从部族宗教上升到普世宗教，同时促进了西非书面语言的普及，进入发达的文字文明时代。对此，作者着重论述了西非“吉哈德”运动的历史过程及其与苏非主义的关系，对西非伊斯兰运动产生的宗教原因、社会经济因素、结果和影响，以及“吉哈德”运动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叙述分析得都很细致到位，是非洲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一次难度很大的尝试。

殖民时期的西非伊斯兰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英、法殖民政府对伊斯兰教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政策，以及穆斯林团体与之合作或反抗的回应，使得伊斯兰教在殖民占领时期不但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有比较大的发展。关于伊斯兰教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作者的专章论述既客观又深入，是综合性，也是专题性的分析研究，填补了国内非洲研究领域的空白点。

当代西非伊斯兰教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伊斯兰，为透彻说明这一问题，作者再次回顾历史，分别从古代帝国时期、“吉哈德”运动时代、殖民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个时期阐述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探讨政教关系的本质。作者认为，古代帝国（加纳、马里、桑海）时期的西非伊斯兰教，主要是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和政权的象征。“吉哈德”运动时代的伊斯兰教已不仅是统治阶层的工具，而日益演变为西非宗教与文化的主要构成之一。殖民时代伊斯兰教的政治功能被弱化，失去主宰一切的独尊地位。面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各种外来的危机，西非伊斯兰教更多地表现出“温和”的一面。战后伊斯兰教以政党形式出现，既服务于世俗民族主义，又积极维护宗教传统。而世俗当政者也拉拢宗教上层在国内、国际交往中

将伊斯兰教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但由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多数伊斯兰政党的作为非常有限。当代西非政治伊斯兰在瓦哈比派和塞来非耶派的激进思想影响下有缓慢增长的趋势，但除尼日利亚北部外，总体上仍表现得比较温和。对此，作者分析了多方面的原因，认为非洲伊斯兰教是伊斯兰苏非主义、基督教、西方世俗文化三种文化成分混合后的文化遗产，尽管多种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和社会经济的因素会促进穆斯林社会对西方的敌对情绪，但西非伊斯兰教的政治观并不限于“乌玛、哈里发、伊斯兰教法”的传统认识，而对西方世俗政治观念有一定的容纳，因此，它正向现代的、政教分离的私人信仰方向发展。

总之，本书对 19 世纪前后西非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殖民时期和当代西非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还有西非伊斯兰教与奴隶制度问题，均有历史的论证和现实的思考。各个章节所涉及的内容都是作者对西非伊斯兰教历史中一些“知识点”、难点的把握，以及一些思考、感悟和体会。诚如作者所说，如果将这些“知识点”和难点比喻为高山的话，那么，本书中的每一部分内容就是一位中国学者在向西非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前进时所碰到的一座座“高山”，这本书就是登山后对“高山”的描述以及“登山体会”。我们期盼着，有更多青年学者像李维建博士一样，凭着勤奋进取精神，追求知识的积累，一步步向学术的顶峰攀登，以迎接社会科学的无限风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俊荣

前　　言

西非、西苏丹与伊斯兰教

谈到伊斯兰教，人们通常首先想到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所代表的伊斯兰教成为许多人观察伊斯兰教的思维定势。事实上，阿拉伯世界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以穆斯林人口来计算，世界穆斯林人口的大多数并不在阿拉伯世界，而在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区。因此，如果以穆斯林人口的多寡作为判断“中心”和“边缘”的标准的话，那么，上述所谓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区”其实并不在“边缘”。据2011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统计，西非仅尼日利亚一国就有7800多万穆斯林；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公认的年增长率最少达3%。^①与世界其他各大宗教的增长率相比，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这至少说明，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伊斯兰教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伊斯兰教，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中西部非洲的伊斯兰教，不论历史基础和现实影响，都最为引人瞩目。但是，中国读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的了解并不多，西非由于距离中国遥远，很少被纳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但是，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社会、“地球村”的时代，西非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也可能在东亚的中国引起一场“风暴”。中国正急速地进入全球化进程，现实逼迫我们有必要了解和理解西非的伊斯兰教。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 October 2009.

西非是一个现代概念，是随着欧洲人的探险活动和殖民入侵而产生的与北非、东非、南非、中非相并列的地理概念。西非这个称呼的产生实际上标志着西非即将迈入全球化的时代。从地理学上说，西部非洲地区的范围，东至乍得湖，西濒大西洋，南濒几内亚湾，北接撒哈拉沙漠。西非通常包括西撒哈拉、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及加那利群岛。各国穆斯林人口所占比重从 10% 以内到 99% 不等。西非面积 638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1/5；人口 2.689 亿（2009 年）^①，约占全非洲总人口的 1/3，居民多为苏丹语系黑人，其次为阿拉伯人。穆斯林占总人口的一半稍多。西非自北向南有撒哈拉沙漠、苏丹草原、上几内亚高原等多个气候带。全境地势低平，一般海拔 200~500 米；南部为富塔贾隆和包奇高原，东北为贾多和阿伊尔高原；沿海有平原。气候和植被有明显的纬度地带性。北部的热带沙漠气候区和中部的热带草原气候区为穆斯林最早在西非活动的地区，现在大部分已经完成伊斯兰化；南部的热带雨林气候区，只有独立的穆斯林居民区，并未完全伊斯兰化。内地与西部干热，沿海多雨。西非富铝土、金刚石、石油、金、锰、铁、铜、铌、铀矿等。其中黄金具有悠久的开采历史，是推动古代北非穆斯林商人冒险南下西非的重要贵金属。农产品有油棕、蜀黍、可可、棕榈仁、花生、咖啡、橡胶等，这些热带经济作物也是促进撒哈拉南北商业交流和伊斯兰教传播的中介。当代西非经济以农矿业为主，发展水平在非洲居中。半荒漠带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西非这个名称作为一个近代历史的产物，纯粹是地理学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产生与伊斯兰教并无本质上的联系。

苏丹是与西非伊斯兰教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这里的苏丹并非当代的苏丹共和国，而是古代阿拉伯人对撒哈拉以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称呼。古代阿拉伯人很早就知道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生活着黑人，他们将这个黑人地区称为“比拉德苏丹”，意思是“黑人的土地”，而将北非称为“比拉丹比丹”，意思是“白人的土地”。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比拉德苏丹”简称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opulation, October 2009.

“苏丹”，用以指撒哈拉沙漠以南黑人居住的地区。由于当时阿拉伯人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了解并不多，也不明确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底有多大，他们所用的苏丹这个词实际上仅指称自己曾经涉足并有所了解的撒哈拉以南东西狭长的那部分地区，即西从大西洋，东至非洲之角的干旱、半干旱地带。因此，苏丹这个概念，从它的产生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一个古代历史概念，主要为阿拉伯人所用。近代由于西方文明的崛起，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衰落，西方人常用的西部非洲逐渐取代苏丹一词而大行其道。除了阿拉伯语，现在其他语言很少再使用苏丹这个概念。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非洲历史和非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领域，仍经常用到苏丹。因为在非洲历史与文化背景中，苏丹不仅是一个地理单位，它背后还包含着阿拉伯人与非洲人、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与非洲传统宗教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与文化含义。苏丹这个词凝聚了北非文明、撒哈拉文明以及撒哈拉以南黑人文明之间千余年历史交往的厚重。所以，在阅读中遇到苏丹与西非时，二者虽然都表示联系密切的地理概念，苏丹一词却同时有许多“言外之意”。

为了更加具体地指称苏丹这个干旱、半干旱的东西狭长区域，阿拉伯人又将苏丹自西向东依次分为西苏丹、中苏丹和东苏丹。东苏丹，由于尼罗河纵贯南北，通常被称为尼罗河苏丹。尼罗河苏丹在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存就是现在的苏丹共和国和南苏丹共和国，以及被称为“尼罗河苏丹居民”^① 的众多民族和部族。但历史上的尼罗河苏丹并非仅指现在的两个苏丹共和国，而是指埃及以南，维多利亚湖以北的尼罗河流域及其邻近的地区，东边以红海和印度洋为界，实际上涵盖了现在东非的部分地区。^② 中苏丹现在主要由乍得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所覆盖。西苏丹则包括比较多的国家，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尼日尔，以及西撒哈拉和毛里塔尼亚部分地区都在西苏丹范围内。即使在当代的学术作品中，西苏丹也是比中苏丹和尼

^① 尼罗河苏丹居民主要指居住在苏丹共和国南部、乌干达、肯尼亚以及坦桑尼亚北部说尼罗河语言的居民。

^② Holt, P. M. "The Nilotic Suda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outh-East Asia, Africa and the Muslim West*, eds. P. M. Holt, Ann K. S. Lambton and Bernard Lew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35.